

嶺南叢書

长兴学记

〔清〕康有为撰
陈汉才校注

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

长 兴 学 记

〔清〕康有为 撰
陈汉才 校 注

责任编辑：何业光

长 兴 学 记

〔清〕康有为撰

陈汉才 校注

※

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龙门县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5印张100千字 3插图

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

·印数0001—1500册

ISBN 7—5361—0589—4/Z·7

定价：3.20元

广东省高等学校《岭南丛书》

编辑委员会名录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顾问:

王 起 王 越 关履权 陈 华 陈乐素

李育中 周连宽 周鹤鸣 钟旭元 潘允中

主任委员:

管 林

副主任委员:

刘烈茂 常绍温

常务委员:

关步勋 刘翰飞 罗泰昭 徐位发 黄国声
熊福林

委 员:

邓光礼 关步勋 刘烈茂 刘翰飞 汤明耀
汤照连 李大超 李文初 李龙潜 李增杰
吴熙钊 何崇辉 陈汉才 陈永正 陈周棠
陈香白 杨芷华 张其凡 罗泰昭 钟 文
钟贤培 徐位发 洪柏昭 常绍温 黄志辉
黄国声 景海峰 管 林 熊福林

秘 书 长:

关步勋(兼)

副秘书长:

张其凡(兼) 黄国声(兼)

秘 书:

何崇辉(兼) 黄少华

《岭南丛书》编辑缘起

《岭南丛书》者，岭南历代文献之荟萃也。南粤大地，山川毓秀，品物蕃庶，远通洋海。自秦凿兴安灵渠，唐拓大庾岭路，水陆通济，次第开发。南北文化，交流益畅，而世界文明，亦于焉交汇。于是士农工商，各勤其业，开物成务，创造发明，前人之述备矣。鸿文巨著，公藏私藏，珠玉纷陈，无虑百千。然而岁月不居，屡经蠹鱼之蛀蚀；沧桑世变，每遭兵火之摧残；“文革”十年浩劫，典籍毁损有加，群书亟待整理，以兴文化而惠来兹，此丛书之所由辑校也。

溯自岭南文化，早发祥于马坝，旧石器之故物犹存；文献流传，始记述于史迁，赵王佗之遗踪尚在。足征岭南地区开拓甚早，而秦以后，其发展之迅迈，与时而增。举凡政治、经济、科学、文艺诸端，靡不追步中原，灿然可观，间有卓立当时，蔚为先进者。如前人谓制糖工艺，乃公元七世纪自印度传入，然据公元一世纪岭南杨孚所著《异物志》，则知其时我粤人不仅能制糖，且品质远优于印度。又如唐宋而后，岭南之冶炼、纺织等工艺，均已居于全国前列。明代铸钱，高州之炉青钱为成色最高者之一。《广东新语》更记有一冶铁炉需千余人操作之壮观场面。此皆古代岭南人士聪明才智之所创也。

至若思想文化，则如惠能之禅学，远播东洋；张九龄、余靖、丘濬、海瑞之功业文德，永垂后世；陈献章、湛若水、陈澧之哲学、经学，屈大均、陈恭尹、黄遵宪、丘逢甲之诗作，康有为、梁启超之学术思想、维新变法，黎简、居廉、高剑父、高奇峰、陈树人之绘事，皆为后人所赞誉。尤有足称者，则明代黄萧养反抗封建统治之斗争；清世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之壮举，皆足

以振奋人心，而启迪革命之精神。至若三元里人民奋抗英兵，严惩侵略者之凶焰；孙中山高举革命义旗，遂摧二千多年之帝制，尤为伟烈丰功，名垂青史。

至言贸易，则名城广州，早立市舶之司；工贾云集，更成通商之埠。若夫波罗庙内，长祀南海之神；怀圣寺旁，永矗求风之塔，此乃舟子风波之祈祐，远洋贸易之航标，而为古代商务繁荣之见证。举要言之，则顺德之蚕丝、广州之牙雕、石湾之陶塑，早已贸迁海外，驰誉四方矣。

至于岭外人物，莅止南州，而留有嘉绩德风者，则如陆贾大夫之祠堂，永镌开发之功；达摩祖师之初地，遂启禅宗之绪；韩愈教化潮州，文风丕振；包拯抚循端水，清范长存；葛洪之丹灶，可溯道教承传；苏轼之歌吟，堪瞻风流文采；文天祥之抗敌成仁，陆秀夫之负帝蹈海，林则徐之销烟御侮，关天培之血战捐躯，咸令人瞻式不已也。

兹所列举，不过荦荦大端，前贤往迹，备详典籍。惟是文献累代承传，浩如烟海，对此宝藏，前人曾有《广东丛书》之辑，欲以保全续绝，用意良深。詎以时世变迁，未竟其业。我等深恐时愈久而版册弥湮，岁日迈而耆宿渐老，故承上级之委托，发同人之热忱，踵武前贤，从事整理。惟感责任之艰巨光荣，惭才力之菲薄难胜。仅择其尤重要者，先为理其错简，补其残缺，标点分段，校勘谬讹；译句释词，间加按语；至于探源索隐，钩深致远，亦将次第展开，尽力而为。务期便于披览，广为流传，俾读者仰先哲之高风而立德立志，感故里之文明而爱国爱乡。学术则寻源别委，以明历代思想发展之条贯，有承有传；名胜则问果求因，俾悟创业之艰难而珍今珍昔。是当大有助于社会主义之建设，增进热爱桑梓之情怀者也。然而独力难支，众擎易举，惟盼国中达人，海外名宿，惠予支持指导，庶几共观厥成，则幸甚矣。

《岭南丛书》凡例

- 一、本丛书收集岭南学者、作家之著述，及其他有关岭南之文献，包括文、史、哲、地、经、法诸类。
- 二、本丛书所收古籍下限，断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。特别重要者，可逾此限。
- 三、本丛书着重收历代学术成就卓著、影响广泛之著述，务期反映岭南文献之全貌。
- 四、本丛书着重收有学术价值的稿本、抄本、孤本、善本、罕见本。
- 五、本丛书一般不收巨帙、残本、府志、县志，或学术价值不大者。
- 六、凡字数不足五万字而难以独立成书者，根据以类相从之原则，把若干种合为一编。
- 七、本丛书之整理方式为：标点、校点、校注、汇编、辑佚等。
- 八、本丛书收入之著作，力求选用校刻精、错误少的一种版本为底本，校以通校本或参校本。
- 九、本丛书依照编委会拟定的“标点体例”，采用新式标点进行整理。
- 一〇、本丛书部份著作于书后附录有关作者传记、年谱，以及历代评论。
- 一一、本丛书为便于检索，原无目录者，均新编目录。

前 言

《长兴学记》(以下简称《学记》)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、教育家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讲学时,亲手制订的完整的教育纲要。它在办学指导思想、办学方向、教育内容、教育制度、分科要求、教学方法等方面,都作了系统而简要的说明,是研究康有为政治哲学观、文学观、历史观、文化教育观的重要著作。

《学记》是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危机的必然产物,也是康有为维新变法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。

康有为痛睹列强瓜分中国,清廷腐败无能,国家民族危亡,立志变法维新。公元1888年,他利用上京应顺天乡试的机会,写了五千字的《上皇帝书》,要求“变成法,通下情,慎左右”。当时清室昏官,不仅扣压奏折,而且还讥讽他是“狂生”。“《治安》一策知难上,只是江湖心未灰!”(《感事》诗,见崔斯哲手写《南海先生诗集》)康有为并没有因此而丧气,他深切地感到,靠少数几个人维新变法是绝对不成的,必须设立学堂,广育维新良才,大造变法舆论。因此,他于1891年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,作为育才、讲学、著书、宣传的阵地。为了使师生明确教育方针、办学宗旨、规章制度、教学内容和方法,康有为亲手撰写了著名的《长兴学记》一书。正如康有为自己所说的,1891年“始开学于长兴里,讲学,著《长兴学记》,以为学规”(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第22页)。

《学记》揉入了学习西方新学的积极成果,为创办资产阶级新式学堂指明了方向,对培养维新变法人材起了积极的作用,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。

首先,《学记》抛弃了封建主义“残废”、片面的教育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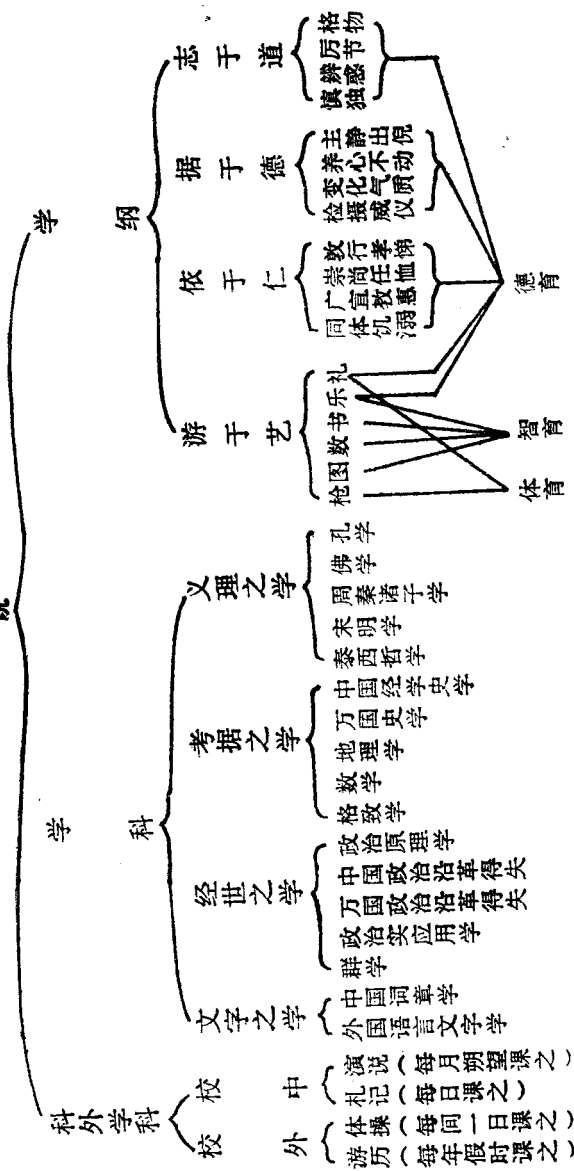
针，提出了德智体和谐发展的教育方针，这在近代教育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。

康有为认为，办好一所学校，除了选择好校长教员之外，最要紧的是制订正确的教育方针、教育宗旨。他揭露封建主义在培养人材规格上重德育智育，轻体育；重经训，轻实学；重记忆，轻智能；重八股，轻新学的种种弊端，抨击这种“片面教育”、“残废教育”只能培养“呆缺之才”，虽“为巍科进士，翰苑清才，而竟有不知司马迁、范仲淹为何代人，汉祖、唐宗为何朝帝者。若问以亚、非之舆地，欧、美之政学，张口瞪目，不知何语矣”。这样培养出的“无用”“蠢才”，实在“流为笑语”。（见《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》）他根据西方资本主义政治、经济发展的要求、变法维新的需要，效法泰西教育制度，在《学记》中提出了德智体各育和谐发展的教育方针。

从“长兴学说”系统表中可见，康有为在《学记》中，规定了以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”“四言为纲”（《学记》第六页），前三者属于德育范围，第四项“游于艺”（康把“六艺”内容改为礼、乐、书、数、图、枪）包含德智体三个方面。梁启超说：“其为教也，德育居十之七，智育居十之三，而体育亦特重焉。”（《康南海传》第11页）这种各育和谐发展的教育方针，比封建主义残废片面发展的教育方针，要高明得多、进步得多。它符合青少年身心特点，适应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，冲破了从古代到清末奴隶主封建主片面残废的教育方针的桎梏，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创举。它提倡“体育”，强调“体操”和“兵式体操”的训练，将体育与习礼、音乐结合起来，“寓武备于文事”，这在当时尚属创新，开辟了我国近代“尚武教育”的先河，也可以视之为后来蔡元培提出“五育”（道德教育、军国民教育、实利主义教育、世界观教育、美感教育）并举、和谐发展的资产阶级教育方针之先导。

“长兴学说”系统表

长兴学说



其次，《学记》在教学内容上，打破了封建传统儒学经学独霸的一统天下，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作为重要的内容，严课诸生，这在当时是振聋发聩、先开风气的一次教育改革。

中国古代官学、私学和书院的教学内容，都是清一色的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，“主要属于纯思辨性质”，两千多年来一直垄断教坛，束缚师生。近代洋务派办洋务学堂，在实行“以中学为体”的同时，也习“西文”、“西艺”、“西技”，派留学生到外国学习自然科学，但那时清政府昏庸腐败，顽固保守，办洋务教育依赖洋人，管理又不甚得法，故收效不大。甲午海战，洋务事业遭到失败。

康有为在维新变法中，学习泰西和日本发展科学技术，强盛国家的经验，在万木草堂开设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课程，要弟子学习“新学”，培养新学人才，为救亡图强、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服务。《学记》规定：“数学举目皆是，至切用矣。测天、制器，尤不可少。而学者苦其繁深，其实既解归除，即可学开方、八线、椭圆矣。近用代数、微积分，尤为径捷。阿尔热八达译本东来，不必叱为远夷异学也。”还指出：“图谱之学久亡，不知书求其理，图求其形，用莫切矣”，“图学从数学入，故从其后”。《学记》大力提倡自然科学，于此可见。在万木草堂教学实践中，众弟子“除读中国古书外，还要读很多西洋的书。如江南制造局关于声、光、化、电等科学译述百数十种，皆所应读。容闳、严复诸留学先辈的译本及外国传教士如傅兰雅、李提摩太等的译本皆读”（梁启勋《万木草堂回忆》）。这就说明，康有为在教学理论与实践上都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的教学，冲破了封建儒学的桎梏，从内容上打开了封建主义教育的缺口，输入了“新学”、“西学”的新鲜血液，扩大了诸生的视野，开风气之先。这种教育内容的改革，比起当时广州几大书院（学海堂、粤秀、菊坡、广雅书院等）单授儒学、理学的封建保守教育，显得特别新鲜。

先进、实用。

再次，《学记》阐发了资产阶级博爱、平等的思想，宣传了维新变法的道理，为进步的、爱国的维新运动在思想上作了必要的准备。

中国古代学校恪守“三纲五常”的祖训，培养忠君贱民、为富不仁的贪官。康有为在《学记》中，批判了这种封建伦理道德，并运用新的观点解释“仁”的思想。《学记》借孔子《易·系辞》，进一步解释说：“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。然则道者，仁义而已。志者，志于为仁义之道。”他视“仁”为做人之本。 “人而无衣，则为裸虫；人而不仁，亦为一裸虫而已。凡所以为学，皆以为仁也。”这就指明了弟子学仁的极端重要性。什么是“仁”？康氏认为，“仁”在家里，就要求“孝弟”；“仁”在对待朋友方面，则要求“相教相周、相亲相恤”，恤于乡党”（均见《学记》）；“仁”对于民众，则要明确“相人偶之义”，“贵于能群”，“同体饥溺”，“普度众生”。（同上）他还以资产阶级道德观对“仁”的本质作新的解释，他说：“仁也以博爱为本，故为善之长”，“苟人而不仁，则非人道”（见康有为《论语注》卷三）。由此观之，《学记》中的“仁”，实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的道德观，就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，就是对封建主义道德观的一个否定，这在当时是一个进步的主张。

《学记》的进步性还在于它能以资产阶级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的人性论，批判长期以来理学家提倡禁锢人性发展的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的理性论，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对人的重视。

长期以来，程朱理学鼓吹“义理之性”，宣扬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。这种唯心论的先验论，抹煞了人的自然本性、人的地位和价值，禁锢了人们的头脑，压抑人们追求合理的物质要求，把人的存在和发展说成是“三纲”、“五常”这种“天理”绝对观念的依存物，还说

是万古不变的，这完全是束缚人们个性发展的蒙昧主义思想。

康有为在《学记》中提倡自然人性论。他说：“夫性者，受天命之自然，至顺者也。不独人有之，禽兽有之，草木亦有之。附子性热，大黄性凉是也。”他认为，人的自然本性是相近的，“夫相近，则平等之谓，故有性无学，人人相等”（《学记》），无所谓“义理之性”。这就是说，人生来就具有欲望，这是正常的感情。“人性之自然，食色也，是无待于学也。人情之自然，喜怒哀乐无节也，是不待学也。”（康有为《性学论》）所以他认为“性”，“乃是生之质也”（《南海康先生口说》）。性是人和物本身自然生成的性质，自然有欲望，并不是先验地体现了封建“三纲”、“五常”的抽象之“理”。这样就把程朱封建理性论的基石抽掉了。从这个命题立论出发，康有为进一步批判了各种人性论，指出“宋儒专以理言性，不可”，“孟子性善之论，有为而言；荀子性恶之说，有激而发”，“朱子‘性即理也’，未当”。他赞成“告子生之谓性”的论断（均见《学记》），称赞告子之论性“自是确论”。

康有为在阐明人的自然本性的同时，还强调“人能学则贵，异于万物矣”（《学记》）。这与他在《大同书》指出人是“天地之精英”一样，表明了他对人的社会作用和尊严的认识的新飞跃。

康有为的人性论，抨击了封建理学家“性即理”的论调，反映了资产阶级对“民权”、“平等”、“博爱”的追求，阐发了近代资产阶级“天子人权，平等独立”的人道主义思想，在当时起了启迪人心、新人耳目的积极作用。

康氏还通过《学记》，阐发了“穷变通久之理，求孔子经世之学”；强调“扫除歆之伪学”，“以知孔子之改制”；宣传孔子论述增删损益、荀子法后王之说，等等。这实际上以简炼的文字，说明了《大同书》、《孔子改制考》、《新学伪经考》的基本观点，为维新运动作了舆论上、干部思想上的准备。

第四,《学记》提倡学术和政治的统一,开创学术联系社会实际的新学风。

清末教育腐败、空疏,学风不正。士子以辞章训诂相攀比,以科名相竞高。古今文学者寻章摘句、专事琐证,脱离社会政治之风日益泛滥于教坛、文坛。龚自珍竭力反对这种脱离实际的学风,提倡学术与政治的统一。他认为“一代之治,即一代之学……是道也,是学也,是治也,则一而已矣”(《乙丙之际著议第六:治学》)。康有为进一步揭露:“学校则教及词章诗字,寡能讲求圣道,用非所学,学非所用,故空疏愚陋,谬种相传,而少才智之人。”而一些醉心于功名利禄之人,则“求富贵而废学业。标之甚高,束之甚窄”。(皆见《上清帝第二书》)康氏继承和发扬龚自珍关于学术政治求道统一的思想,提倡“经世致用”,主张学术为政治改革和变法维新服务。他在《学记》中写道:“故孔子作《春秋》,专以经世也。”“故经世之学,令今可行,务通变宜民。”他要求为学处事,“宜取人事至切,经世通用者”。他强调学以致用原则,认为“凡六艺之学,皆以致用也”。在万木草堂教学实践中,康有为“与诸子日夕讲业,大发求仁之义,而讲中外之故,救中国之法”(《自编年谱》),还与诸生共同撰写学术著作《孔子改制考》、《新学伪经考》、《春秋公羊学》、《春秋董氏学》等,为维新变法大造舆论;师生共同创办各种学会组织,参加“公车上书”活动,使学术更好地服务社会政治改良。张伯桢说得对:“先生治学,以勇猛之力,辅以深湛之思,灼古知今,隐然以天下为己任。目击当时朝政日非,外侮日亟,非急起改革,不足以图存,遂谓治学莫先于救国,救国莫大于改制,后之屡次上书,即所以学成致用也。”(《万木草堂始末记》)所有这些,都一扫学术脱离政治,为学术而学术的不良风气,开创了学术联系实际、服务社会的新学风。它与当时广州五大书院“以辞章训诂相竞高,以追逐科名为鹄的”学风相比,无疑是进步的,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。这是对东汉太学生和明代东林书院师生反对宦官、

倡行“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”的良好学风的继承和发扬。

总之，《长兴学记》是康有为亲手制订的进步的教育纲领，是在教育教学领域内树立起来的一面资产阶级改革的旗帜。在反对封建主义传统教育、宣传资产阶级新思想、培养维新变法人才方面，《学记》是起过历史进步作用的。万木草堂的八年教育教学实践，是按照《学记》指引的方向去进行的。实践证明，康有为创办万木草堂，为后来变法维新作了舆论准备，也为维新运动造就了一批栋梁之才。

《学记》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书院“学规”、“教条”、“学约”（如《朱子白鹿洞书院教条》、吕东莱《丽泽堂学约》、顾宪成《东林会约》等）关于“气节自厉”、“学以致用”、“熟读精思”、“躬行亲践”等的优良传统，并揉入了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内容，熔铸出资产阶级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的新思想，比古代所有“学规”、“教条”都进步得多、科学得多、实际得多。在“学规”、“教条”发展史上，具有承先启后、继往开来的积极意义。事实上，后来湖南时务学堂的“学约”、广西广仁学堂的学规、上海天游学院的章程，都是以《长兴学记》为楷模而制订的。梁启超也承认以后的学规是仿照《长兴学记》的。他指出：“（先生）后又讲学于桂林，其宗旨方法，一如‘长兴’（学记）。”（见《康南海传》第8页）

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讲课内容，以后由他的弟子“笔记”而整理成《南海康先生口说》（以下简称《口说》）。《学记》与《口说》在精神上是一致的。在弘扬圣道，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、道德观与人道主义，为维新变法宣传鼓吹等方面，两者的基本观点是相同的。但两者又有较大的区别。《口说》重点在讲述学术源流、文学训诂，而《学记》重点则在规定教育方针、教学大纲；《口说》详细阐发了“孔子改制”之精义、先秦诸子之学，而《学记》则扼要讲明四条“学纲”和四门“学科”；《口说》主

要

是康有为讲课具体内容的记录整理，而《学记》则主要是对教育纲领旨趣、教学内容与教学制度的原则说明。一巨一细，一纲一目，相辅而相成，相佐证而相生辉。可以说，《学记》为《口说》规定了讲学的方针、纲要，而《口说》又是对《学记》的具体阐发。

自然，《学记》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和错误。首先，它强调尊孔读经，教学内容以“六经”为主，规定草堂要定期举行祭孔典礼、朝廷典礼，说明康有为的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对封建主义的妥协性；其次，对孔子改制作了符合资产阶级要求的新解释，虽不乏发人深省的见解，但不少地方牵强附会，在分析中外结合、古今文化结合问题时，也不尽科学，表现出某些主观比附的错误；再次，《学记》一书中存在着封建主义正统观，例如康氏一边褒扬孔子、周公、尧舜诸圣，一边贬斥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、李自成，诬蔑他们“不学无术”、“与圣人相去甚远”。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康有为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，这只能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去考察评价，而不应苛求于前人。

关于校注《长兴学记》，有四点说明：

第一，《长兴学记》是由广州万木草堂于光绪十七年(1891年)夏四月刻印的。次年上海思求阁斋重刻之。以后各地都流行一些翻刻本。今以万木草堂1891年原刊本为底本，以上海思求阁斋版和羊城文升阁校刊本为主要对校本，并参考上海蜚云雷版，进行校对标点。

第二，康有为引文有误的地方，保持本来面貌，只在校勘或注释时才加以考辨校正。

第三，《长兴学记》过去没有人系统全面地注释过。今考虑到它是用文言文写成的，且用典颇多，故进行适当注释。

第四，为了帮助读者全面了解《长兴学记》，特选择有代表性的康门弟子及学人的回忆文章和专著(节录)，以及一些重

要的参考资料，附录于后。

本书初稿曾作为研究生必修课和本科高年级学生选修课的教材，中间曾经两次修改。正式出版前，作者又作了较大的修改。在校注过程中，吸取了一些专家、学者的研究成果，得到中山大学陈永正先生、黄国声先生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何业光编辑的指导、支持和帮助，谨致衷心的感谢。由于个人学识浅薄，错漏一定不少，恳请读者和专家指正。

陈汉才

1990年12月10日于华南师范大学